



# 三方交际的语用学研究

A Pragmatic Study of Triadic Communication

夏登山 著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 三方交际的语用学研究

A Pragmatic Study of Triadic Communication

夏登山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方交际的语用学研究/夏登山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8

ISBN 978-7-100-16581-5

I. ①三… II. ①夏… III. ①语用学—研究 IV. ①H0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04085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三方交际的语用学研究

夏登山 著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顶佳世纪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6581-5

---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3 1/4

定价:49.00 元

#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 序

夏登山博士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通过验收，并被指定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获此消息，我感到十分高兴。他请我写序，我又一次想起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在1922年写的有关作序的一句话：“会作序的要做到叫看书的不喜欢看序。”大师戏言，功在字里行间。我辈效颦，意在歪打正着。尤其为弟子的专著写序，易见长不见短。讨个“不喜欢”，属意料之中。因此，作不作序，无关紧要。

登山聪明勤奋，博闻强记，善于思考，勇于质疑，恪守学术规范，文字掷地有声。这并非言不由衷的套话。他201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赴芝加哥大学语言学系联合培养一年，前后三年圆满完成了学业，以优异成绩通过答辩并获得博士学位。随后进入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师从蓝纯教授，也得到过北外长江学者讲座教授、语用学家黄衍先生等知名学者的点拨，两年后出站留校任教并晋升为副教授。他毕业以来，主持过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北京市社科联青年社科人才资助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和特别资助项目等多个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在《外语教学与研究》《现代外语》《外国语》《中国外语》等刊物上发表了20多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期间投给德古意特（De Gruyter）公司出版发行的跨学科国际期刊 *Journal of Politeness Research* 的论文，得到了匿名评审专家的认可，被正式录用。在他的专著即将付梓之际，我对他表示衷心的祝贺。

众所周知，现代语言学诞生之前，语言研究没有明确、完整的对象。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指出，言语具有多种双重性，如果从其多面性出发，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好似多种“异质”的杂合；从任何一个角度出发，都会涉及完全不同于语言学的其他科学，如心理学、人类学、语文学等（1959：8～9），而语言学真正唯一的研究对象是语言生活的“常态”（72）。乔姆斯基在《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中指出，现代语言学理论一直注重完全“同质的”言语社团中“一个理想的说者—听者”（an ideal

speaker-listener); 完美的语法理论必须用结构描写来说明某个句子如何被“理想的说者—听者”所理解, 而且只有在“理想化”的层面, 实际运用(performance)才能直接反映潜在能力(competence); 要研究实际运用, 必须考虑一系列因素的互动, “说者—听者”的潜在能力仅是其一, 因此语言研究与其他复杂现象的实证调查没有两样(1965: 3~4)。

源于英国日常语言哲学的经典语用学以“理想的说者—听者”为默认模式进行概念分析。现代交际理论也以“说者—听者”为默认的原型框架。民族志学和会话分析(Conversational Analysis)研究扩展了这一默认原型框架, 提出了对多方会话进行研究的必要性。原因很简单, 真实的人际交往互动并不总是限于两人之间, 一个说者面对的往往不是一个听者。即使说者的意向对象只有一个听者, 也不能完全回避第三方(一人或多人), 有时候要刻意把第三方纳入话语场。总之, “第三方”是一个极具社会语言学和语用学价值的角色。语言学家、语用学家和文学文体学家里奇(Geoffrey Leech)在《语用学原理》(1983: 13)中指出, 实际接受到信息的人, 并不一定是信息的“收件人”, 而可能是个“旁观者”或“偷听者”。语用学家托马斯(Jenny Thomas)在《互动中的意义》(1995: 56)里甚至指出, 要做好语用学, 在观察人们最随意的谈话时必须做个真正的“偷听者”才行。社会语言学家拉波夫(William Labov)早就主张社会语言学家要隐身, 在说话人意识不到被观察的情况下考察他们使用语言的方式。他在《社会语言学模式》一书中指出, 在社区里进行语言学研究, 目的是在人们不受系统观察的情况下搞清楚他们如何谈话, 但也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得到语料(1972: 209)。我无意探讨社会语言学家的“观察者悖论”, 而是强调“双方”交流模式中第三方“参与者”身份和角色的客观存在对实际会话活动的潜在影响。

会话的最小模式是两个参与者。但日常生活经验告诉我们, 两人进行话语互动时, 现场有没有第三方或潜在的第三方, 并非无关紧要。现实生活中的“借一步说话”, 谍战片中两人打开音响或水龙头在噪声中小声交谈……, 都是在屏蔽第三方。生活片中的指鸡骂狗、指桑骂槐, 或者说者意识到窗外有人而故意提高嗓门……, 都是说给第三方听, 类似情景数不胜数。总之, 理想的“说者—听者”模式或默认的“1对1”会话研究模式, 不能满足现实中“1对1+n”的会话事实研究。

登山的三方交际语用学研究, 有可圈可点之处。第一, 他从现实交际中复杂的参与者角色事实出发, 不满足于学界把参与者抽象为最小的“说者”和“听者”两个角色类型, 但也不完全同意用旁听者角色颠覆话语设

计甚至推翻格莱斯经典会话含义理论的激进看法。第二，他从多方交际中最小的三方参与者框架出发，研究说者的话语设计和两个听者对同一话语的不同理解与推理，从而探讨了人际会话中的三角关系。第三，他在语用学视角下系统考察了汉语语境中三方交际行为的结构规律，既佐证和补充了西方经典面子理论，又有助于语用学理论的本土化。第四，他在经典交际责任理论之上建构了三方交际责任理论框架，定量分析了《红楼梦》前八十回中的部分三方互动话语，在语言学和文体学层面解释了几位主要人物形象的刻画，形成了一条从语用学、交际行为研究、话语分析到文学文体学的线索。第五，他基于两方交际原型框架下研究的不足，突出了说者对第三方参与者的（不）礼貌行为，提出了三方交际参与者之间的面子联盟、联盟成员的面子叠加、面子维护与威胁、面子行为的转化以及面子的借用等概念。通过三方交际面子理论的针对性分析，解析了《红楼梦》人物对话中的面子维护和威胁行为，既有文学语用学价值，也有红学研究的参考价值。

研究三方交际话语互动，最理想的语料是来自现实生活中有代表性的真实谈话。登山在博士论文选题关头，我们师徒就语料来源纠结过，因为这涉及论文的最终走向。他的最初个案分析源于《红楼梦》里常见的“指桑骂槐”场景，并以小说中两人之间对话少、多位听者在场的对话多这一明显特征为切入点作为选题，我是支持的。不少文体学家指出过书面话语与口头话语、虚构对话与自然会话之间的本质差异，但也承认书面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是口头话语的某种转写或再现，文学中的虚构对话是对真实的自然对话的高度模仿和提炼。经典语用学家们使用的例子大多是日常口语，但与社会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使用的实例不同。当代语用学研究的语料不限于口语，对书面文本的作者—读者关系及虚构世界里的人物关系（如面子、礼貌、合作、言外之意等）涉及的一系列问题也同样重视。因此，书面话语既需要语用学分析，也可以作为有效语料来支持和扩展语用学研究。虽然社会语言学家会反对用虚构对话来研究语言学问题，但公认的文学作品里的虚构对话不同于伪造的背离现实的虚假对话。这种话语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社会语言学家在田野调查中面临的“观察者悖论”。《红楼梦》是经典文学名著，其中的对话和场景艺术体现了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和人际互动规约，符合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经验和直觉。从文体学角度看，对文学文本中的虚构话语进行语言学描写和分析，是研究小说文本和人物性格塑造等许多问题的重要手段。但语言学描写和分析不是文体学的最终目的。阐释文本的文学意义，也是登山在主观上试

图兼顾到的。

登山提出的三方交际研究框架,批判了会话研究中默认的“听者同质”假设,拓展了三方交互(triadic exchange)行为的人际交流研究。从听者并非同质的事实出发研究三方交际,登山为自己,也为同行,开辟了一个值得进一步探索的话题。学无止境,后续工作依然任重道远。比如,听者的类型包括各种情境下实际接收到信息的所有角色,除了旁听者、偷听者,还有监听者等。第三方还可分为主动与被动、有意与无意、直接与间接、明确与隐含等多种对会话有影响的虚拟或实际参与者角色。说者其实也并非同质,有真实与虚构、直接与间接、明确与隐含之分。在传播学等学科的视野下,把“听者—说者”模型上升到更宽泛的“信息发出者—信息接受者”(addresser-addressee 或 sender-receiver)层面时,书面话语的“说者”与“听者”也并非同质。澳大利亚文学理论家洛夫(Harold Love)在《论作者身份》(2002年剑桥大学出版社)一书中把“作者”划分为四类。现代小说理论和叙事学关注的作者和叙述者等不同身份的“说者”及读者和受述者等不同身份的“听者”是否也可以在语用学框架下进行文学交流的研究?本研究对书面文本和多媒体、多模态文本的受众角色类型划分是否有参考价值?本研究对文学语用学有多大贡献?反过来看,文学语用学研究对现实人际交流研究有多大参考价值?这些问题也许并非本书要涉及的,但有心的读者也许能从中得到一定启发,也许会提出完全不同的看法。登山虚心好学,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和建议,我也乐于听取同行读者的意见和看法。

希望登山再接再厉,在跨学科视角下继续探索,多出成果。

封宗信

2018年春于清华园

## 前言

本书以“三方交际”为研究对象，基本出发点是：Austin (1962) 和 Searle (1969) 的言语行为理论以及 Brown & Levinson (1978/1987) 的面子理论等经典的语用学理论大多以“说话者—听者”的两方框架为交际原型，没有充分考虑其他在场者对话语交际行为的影响，而事实上，不同类型的第三方交际者在不同程度上参与话语的设计和理解，影响、制约着三方交际中的信息传递和关系建构。基于这一理念，本书对两方听者的话语角色类型、三方交际的分类、三方群体中的联盟和三方交际行为结构等一系列问题展开讨论，建构了三方交际的听者角色分类模型、参与度模型、互动关系模型和涵盖排除模型等，并以《红楼梦》中的三方会话为语料，修正了 Clark & Schaefer (1992) 的交际责任理论和 Brown & Levinson (1987) 的面子理论，从而提出三方交际责任理论和三方交际面子理论，尝试在汉语语境下推动西方语用学理论的本土化发展。

三方交际研究对于以话语交际行为为考察对象的语用学和交际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Clark & Schaefer (1992) 曾声称：“如果将旁听者纳入考察范围，关于话语设计和 Grice 会话含义的所有理论都需要重新修订。”这一论断或许言过其实（参见本书第七章），但第三方在场影响了群体交际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和话语产出/理解机制，这是毋庸置疑的。不论是《红楼梦》等文学作品的人物会话还是自然的日常交际行为中，绝对的两方交际往往并不多见，有旁观者或参与者在场的三方和多方会话反而更加常见。忽略这种更重要的交际类型，而将所有会话过度概括为“说话者—听者”两方之间的交际行为，必然会降低理论本身的解释力。

本研究的启示之一是，语言学研究中许多源于自然语言的重要概念和术语都先天带有自然语言的模糊性，而审视、反思这些基础概念和术语，有助于发现新的研究问题和视角。Grice (1957) 对“意义” (meaning) 的思考，以及对“自然意义” (natural meaning) 和“非自然意义” (non-natural meaning) 的辨析推动了会话含义理论的形成；Clark & Carlson (1982)

根据“听者”(hearer)和“直接接受者”(addressee)的区分批判了经典言语行为理论忽视旁听者的不足。本书认为,Clark & Carlson (1982)对“听者同质”假设的批判不够彻底。受到自然语言的诱惑,他们似乎假定了“直接接受者”是听者话语角色的最小单位,而我们立足汉语文化中“指桑骂槐”这一独特的三方交际现象可以发现,“直接接受者”实际上仍然可以进一步切分为“桑”和“槐”两种类型的话语接受者。我们据此重新划分听者角色的类型,作为本书模型建构和语料分析的理论工具。如果我们能够用更加敏锐的眼光审辨经典理论的某些基本假设及其所默认的自然语言概念、术语,可能会得到更多新的发现。

在信息量和创新度既定不变的前提下,著作越厚,阅读行为的“收益—成本比”就越低。前辈学者也曾指出,故意将篇幅拉长就相当于间接谋杀读者。因此,本书撰写时力求简洁,将正文控制在20万字以内。近年来关于三方交际研究的某些思考并没有完全纳入本书章节,例如拙文《三方恭维回应策略研究》(载于《外语教学与研究》2017年第5期)对比了两方语境和三方语境下的汉语恭维回应行为,发现汉语三方恭维回应的西化程度并不像国内外学者所声称的那样高,有第三方在场时,被恭维者首选回避和拒绝的回应策略,以免有损第三方的面子。可以大胆推测,在三方语境下,请求、道歉等所有传统的言语行为研究的结论都需要重新检验,这些相关问题有待学界同行将来共同探讨。

本书撰写有幸得到国内外学术界许多良师益友的指导和帮助。我的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封宗信教授自我攻读博士学位开始一直给予精心的指导,为将我扶上学术研究的道路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从论文选题到获得学位后的研究拓展以及项目申请,每前进一小步都离不开导师的栽培,本书付印之际,又承蒙导师赐序,感激之情无以为报。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北京外国语大学蓝纯教授在本书撰写过程中也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并亲笔修订、逐字批改了三方交际面子理论的部分内容。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任教以来,有幸担任教育部长江学者黄衍教授的研究助理,在科研方法、论文撰写和为学之道等许多方面得到黄老师的指导。此外,在本书选题至出版的过程中还得到清华大学外文系刘世生教授、崔刚教授、范文芳教授,芝加哥大学语言学系 Salikoko Mufwene 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吴一安教授、王克非教授、陈国华教授、孙有中教授、王文斌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冉永平教授、对外经贸大学向明友教授、北京大学姜望琪教授和南京师范大学张辉教授等师长的指导和关怀,无法一一当面致谢,但诸位前辈的栽培和恩情,时刻不敢忘记。

从构思、选题至定稿、出版，本书撰写前后历时10年。为了让一个寒门学子能够静心从事清贫的学术研究，10年来我的家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父母年迈，仍为我们操持家务、看护幼子；岳父岳母不计回报，一直竭尽全力支持我们；妻子随我陋室蜗居至今，并尽力担起教育儿女之责而毫无怨言。没有家人的牺牲和奉献，拙作绝无可能问世。

本书部分章节曾以论文形式发表于《中国外语》《现代外语》《语言学研究》《外语研究》和《外语学刊》等期刊上，此次整理出版时对相关内容进行了修改、润色。定稿期间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许国璋语言高等研究院和英语学院各位领导的大力支持，出版工作由商务印书馆太原分馆总编辑李智初先生和本书责任编辑冯淑华女士的团队负责，编辑校对工作专业、严谨、高效，为本书最终顺利出版提供了有力保障，在此一并感谢。

本书作者是一名初入门的学术研究人员，对语言学相关理论的理解多有偏误，对《红楼梦》人物会话的解读也难免主观，恳请各位读者不吝赐教，作者的联系信箱是：xiadengshan@bfsu.edu.cn，谨此致谢！

2018年5月  
于北京外国语大学

# 目 录

|                                |     |
|--------------------------------|-----|
| 图表与公式 .....                    | 1   |
| 第一章 导论 .....                   | 1   |
| 第一节 语用学研究的两个视角：意义研究与行为研究 ..... | 1   |
| 第二节 行为研究中的两方交际预设 .....         | 4   |
| 第三节 多方交际研究的现状 .....            | 6   |
| 第四节 选题意义 .....                 | 12  |
| 第五节 章节设计 .....                 | 13  |
| 第二章 三方交际的听者类型 .....            | 22  |
| 第一节 两方交际与多方交际 .....            | 22  |
| 第二节 听者分类模型 .....               | 25  |
| 第三节 听者分类模型的修正 .....            | 32  |
| 第四节 参与度模型 .....                | 36  |
| 本章小结 .....                     | 39  |
| 第三章 三方交际的结构与分类 .....           | 40  |
| 第一节 三方交际的四要素 .....             | 40  |
| 第二节 三方交际的结构模型 .....            | 47  |
| 第三节 三方交际的分类 .....              | 55  |
| 第四节 三方交际中的联盟 .....             | 60  |
| 本章小结 .....                     | 67  |
| 第四章 三方交际的行为研究 .....            | 68  |
| 第一节 三方话语的接受：感知、识别、理解 .....     | 68  |
| 第二节 听者角色的分配/识别机制 .....         | 72  |
| 第三节 听者角色设计：涵盖原则与排除原则 .....     | 79  |
| 第四节 意义设计：分配和隐藏 .....           | 83  |
| 第五节 三方话语设计的交际二重性原则 .....       | 97  |
| 本章小结 .....                     | 104 |

|                             |     |
|-----------------------------|-----|
| 第五章 三方交际责任理论 .....          | 106 |
| 第一节 交际责任理论 .....            | 106 |
| 第二节 三方交际中的责任理论 .....        | 112 |
| 第三节 三方交际责任理论的应用 .....       | 121 |
| 本章小结 .....                  | 133 |
| 第六章 三方交际面子理论 .....          | 134 |
| 第一节 面子理论与礼貌研究的“后现代转向” ..... | 134 |
| 第二节 三方交际的面子理论 .....         | 142 |
| 第三节 三方交际面子理论的应用 .....       | 165 |
| 本章小结 .....                  | 168 |
| 第七章 结语：三方交际与语用学研究 .....     | 170 |
| 第一节 各章节主要观点 .....           | 170 |
| 第二节 三方交际研究的意义 .....         | 171 |
| 第三节 不足之处与未来研究的展望 .....      | 174 |
| 参考文献 .....                  | 176 |
| 索引 .....                    | 193 |

## 图表与公式

### 图

|       |                                      |     |
|-------|--------------------------------------|-----|
| 图 2-1 | Clark & Carlson (1982) 的听者分类 .....   | 27  |
| 图 2-2 | Kádár & Haugh (2013) 的听者分类 .....     | 27  |
| 图 2-3 | 修正的听者分类模型 .....                      | 34  |
| 图 2-4 | Bell (1984) 参与度的同心圆模型 .....          | 37  |
| 图 2-5 | 两方听者的参与度模型 .....                     | 38  |
| 图 3-1 | Jakobson (1960) 话语交际六要素 .....        | 41  |
| 图 3-2 | Shannon & Weaver (1949) 信号传递模型 ..... | 42  |
| 图 3-3 | 三方交际的互动关系模型 .....                    | 54  |
| 图 3-4 | 对称型三方交际的参与度 .....                    | 58  |
| 图 3-5 | 不对称型三方交际的参与度 .....                   | 59  |
| 图 3-6 | 三方交际的两种分类法 .....                     | 59  |
| 图 3-7 | 三方交际的简便分类法 .....                     | 60  |
| 图 4-1 | 涵盖、排除的强制性与实质性 .....                  | 81  |
| 图 4-2 | 三方交际者的语境背景信息关系 .....                 | 86  |
| 图 4-3 | Barthes (1968) 的含蓄意指型符号系统 .....      | 90  |
| 图 4-4 | 含蓄意指型三方交际 .....                      | 91  |
| 图 6-1 | 五种可能的面子威胁行为策略 .....                  | 136 |

### 表

|       |                             |         |
|-------|-----------------------------|---------|
| 表 2-1 | Levinson (1988) 的听者分类 ..... | 30 ~ 31 |
| 表 3-1 | 三方交际的四要素 .....              | 42 ~ 43 |
| 表 4-1 | 对称型三方交际的话语设计类型 .....        | 88      |
| 表 4-2 | 附属型三方交际中第三方对两种意图的接受 .....   | 97      |

表 5-1 《红楼梦》前八十回多方话语统计表..... 122

表 5-2 主要人物涉及指桑骂槐型三方交际统计表 ..... 132

表 6-1 主要角色在参与型三方交际中的礼貌特征 ..... 166

表 6-2 黛钗承担礼貌责任的抽样统计表 ..... 167

表 7-1 各章节主要观点 ..... 170 ~ 171

公式

公式 2-1 三方交际中两方听者的参与度 ..... 38

公式 6-1 Brown & Levinson (1987) 面子威胁度计算公式 ..... 135

公式 6-2 面子借用中三方交际者的面子资本关系 ..... 159

# 第一章 导 论

分析哲学家将传统哲学止步不前、纷争不断的根源归结为自然语言的模糊性,主张以人工语言作为哲学思辨的工具 (Russell 1918/2010: 22 ~ 26; Wittgenstein 1922/2003: 31, 37)。这个哲学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 (Rorty 1967)使语言不再仅仅是哲学的使用工具,而成为哲学反思自身传统的基础和出发点。日常语言学派主张回归自然语言,通过研究日常语言的用法澄清哲学中的混乱 (Wittgenstein 1953/1967: 48e ~ 49e; Austin 1961/1970),这直接推动了语用学的诞生。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语用学研究逐渐兴起,语言的使用开始成为哲学、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等共同的研究领域。人们如何运用语言达成理解、实现交际目标由此成为以上各学科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但不同领域的学者对语言的使用存在诸多相去甚远的看法,在考察语言使用行为时所选择的视角以及研究者所持的理论预设也各不相同,语用学的发展也因此见证了许多流派的兴起和争论。本书选择三方交际为研究对象对语言的使用问题进行探索,以期更深入地认识和理解人际交流行为。

## 第一节 语用学研究的两个视角:意义研究与行为研究

语用学研究兴起于后期 Wittgenstein 的语言游戏理论以及日常语言学派 Austin (1962) 和 Searle (1969) 的言语行为理论。后期 Wittgenstein 提出“意义即使用”,主张在说话者使用语言的行为中确定意义。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牛津日常语言学派反对逻辑实证主义者批判自然语言的观点,他们主张在日常语言的使用中研究意义。Austin (1962) 首先提出言语行为理论,认为人们不仅使用语言陈述、描写事情的过程或状态,而且还用它来实施各种言语行为,即所谓“以言述事”(constative)和“以言行事”(performative)的区分,并进一步把言语行为分为“言内行为”(locution-

ary act)、“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 act)和“言后行为”(perlocutionary act)。Searle (1969, 1975) 发展了这一理论, 重新对言语行为进行分类, 并提出间接言语行为的概念。Austin (1962) 和 Searle (1969) 对语言使用行为的研究显然与 Wittgenstein 的“语言游戏”是密切相关的。陈嘉映 (2003: 184 ~ 185) 指出, Wittgenstein 在提出该理论时使用的德文原词 Sprachspiel 比中文译名“语言游戏”更加宽泛, 其后缀 Spiel 更加接近于“没有目的的自由活动”。这正是“行为”成为早期语用学关键词之一的根源, 也是语用学行为研究传统的肇始。Wittgenstein、Austin 和 Searle 之后, 许多语用学研究者都继承了这一传统。Katz (1977: 19) 认为, 语用学理论与语法理论不同, 后者研究语言结构及类型, 而前者研究的是说话者和听者将命题与语境联系起来的推理过程 (参见 Levinson 1983: 8; Mey 2001: 5)。Mey (2001: 5) 指出, 语用学的研究范围是 Chomsky 所区分的语言使用 (performance), 而不是语言能力 (competence), 语用学可以定义为“人类交际中受到社会规则和条件制约的语言的使用” (Mey 2001: 6), 也可以直接说是“对行动 (action) 的研究” (Mey 2001: 208)<sup>①</sup>。Verschuere (1999: 7) 认为语用学研究的是“使用行为中的语言现象”, 并提出顺应论, 认为语言使用的过程就是语言选择的过程, 不管这种选择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 在语言不同层面的选择都必然需要动态地顺应语境因素。Sperber & Wilson (1986) 提出的关联理论虽然注重听者对意义的推理和理解, 但不论是在著作名称“关联: 交际与认知”还是在理论建构过程中, 交际行为都是其核心的研究对象。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说, 对语言使用行为的研究是自 L. Wittgenstein、J. Austin 和 J. Searle 以来语用学的一个重要传统。

行为研究的传统之外, 主流语用学还有一对重要的概念——意义和理解。Grice (1957) 区分了自然意义 (natural meaning) 和非自然意义 (non-natural meaning), 前者体现一种自然的因果关系, 后者牵涉到交际者的意图。这一对概念极大地影响了后继者对语用学的界定和研究。Gazdar (1979: 2) 将语用学定义为“意义—真值条件” (Pragmatics = Meaning-Truth Condition), 认为其研究的核心对象是话语中无法用真值条件解释的那部分意义。这一定义强调意义和理解的对立作为语用学研究的立足之本。Levinson (1983: 11 ~ 12) 在讨论语用学的各种定义时指出, “编码” (encoding) 的概念表明, 语用学研究必然关注意义的某些方面, 或者进一

① Mey (2001) 使用的英文原文是: “Pragmatics is where the action is.”